

南非何去何從：革新抑或革命？

芮正皋

（本文係作者參加今（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在臺北舉行之「第一屆淡江非洲研究會議」所提之論文（South Africa: Evolution or Revolution?），作者對南非局勢之發展有公允的分析，本刊特加轉載，供讀者參考。——編者）

南非的種族問題，是當前國際事件中，最受爭論及最受情緒化指責的問題之一。對世界其他地區而言，今天的南非確已成為一個難以忍受的時代逆流，甚至引起憤怒。從表面來看，南非的情勢是要使白人統治有色人種的古老殖民形式永遠持續下去；也就是一個少數團體尋求以種族歧視的法律，以及武力來確立他們的統治地位；甚且，他們還蔑視了國際社會的願望與感受；以致於在南非，呈現出一種可能引發世界性衝突的潛在危機。

非洲民族特別地感覺到，只要他們在南非的兄弟姐妹的公平待遇與人性尊嚴，不被當地政府所承認與接受的話，非洲的獨立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直至南非所有的人民能自由地決定其命運及參與政府為止，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才會感到滿意。

我們也不能忽視，馬思克主義份子正想利用愛好和平人士對南非的想法，來破壞世界自由。換句話說，當民主國家想消除南非的壓迫與不公道現象時，很可能在無意中，反而助長馬思主義份子控制南非，甚至南部非洲，進而控制整個非洲和世界各地。

因此，本文將先從馬思主義與自由之間鬭爭的意義，來討論南非的問題。其次，再討論南非內部的最近變化。最後，將對南非問題的處理，提出一些建設性的建議。

一、全球觀點下的南非

要瞭解南非問題的爭論及對該問題之情緒的強烈程度，唯有從了解南非是今日世界上兩大衝突的焦點，亦即東西衝突和南北南非何去何從：革新抑或革命？

衝突，才能予以適當的了解。而作為這些衝突焦點的南非，其種族間的關係和種族政策，必然孕含著全球性的象徵意義，雖然南非被迫扮演一個國際上的代罪羔羊（bouc émissaire）之角色。

北美西歐高度工業化國家與南半球低度開發國家間的衝突，是這三、四十年來才形成的現象。這兩個陣營間日益尖銳的關係，主要是源自第三世界對過去殖民經驗的痛恨，以及西方世界持續地控制科技、金融、貿易、投資和西方的「生活方式」。南北陣營間在所得、財富與軍力上的極度不平衡，以及無望改變這種不平衡現象，在在都加深了第三世界的不滿。

面對北半球日益囂張的保護主義及其對南半球產品需求率的不穩定，致使南半球國家的挫折感愈來愈深。加上南方國家對石油與重工業製品購價的節節上昇，而在外債高築下，南方國家受援的實質價格，却又逐漸地下跌。更糟的是，南方國家本身在糧食供應、住屋、就業和社會服務等方面，也感到從未有過的壓力。

凡是修習國際政治者都熟悉蘇聯和中共激發第三世界憤懣的伎倆，也就是將低度開發國家的所有問題，歸責於自由世界。之後，共產國家利用南北衝突，來加強他們對世界優勢的追求。

工業國家無法與亞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和睦相處，更加深了南北對立的緊張情勢。例如，一九八五年九月與十月間，在英國伯明罕與倫敦等地發生了種族暴動。在法國，涉及阿爾及利亞人與摩洛哥人和其他非洲移民的衝突事件，日益增加。瑞典的有色人種也常有種族暴力的經驗。德國人對土耳其少數民族間的敵視雖是潛在的，但也常公開表示。在蘇聯的非洲學生也遭受種族不容的事。美國社會中，在就業、薪資、犯罪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對黑人不利的現象更是不勝枚舉。以上的例子均說明了，南北關係還受到社會與文化等複雜因素的干擾，而這些因素皆非邏輯與理性所能解決。隨著全球相互影響的加強，南北緊張也隨之更為尖銳。

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收入是由西方少數國家生產，而其人口不及全球的五分之一。由這點來看就很明白了，為什麼南非被一般人視為南北關係的象徵——全球衝突在這個小天地中的投影。在南非，大約七分之二的人口（西方後裔）享有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①。在一九七五年，南非白人的個人平均所得是其黑人同胞的十二·五倍^②。白人少數民族在南非的持續優勢，使南非黑人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們的歷經創傷的殖民經驗。毫無疑問地，南非黑人渴望消除這種痛苦經驗。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非洲國家在國際上尋求孤立南非，進行對南非的經濟或其他類型的全球性制裁，甚至發動武裝解放鬥爭

註① Main Committee: HSRC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roup Relations. Pretoria,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The South African Society: Reality and Future Prospects*, 1985, p.21 and 42.

註② 同註①，頁四一。

可是令他們失望與憤怒的是，西方國家不願加入那些會傷害南非經濟的行動，更遑論軍事行動了。非洲人士將西方國家這種不情願的態度歸罪於西方國家只關切與白人少數民族分享投資、貿易和戰略的利益。

蘇聯與中共在非洲的損失比西方國家少，但若排除掉西方的影響力，則他們將有所斬獲。因此有一種自然的趨勢是，非洲人士對南非種族政策的不滿，已轉變成為非洲與共產國家的結盟。我之所以用「自然的趨勢」一辭，是經過一番思慮的，因為在實際上，把非洲國家和領袖與西方國家（尤其是昔日的大國）相連結的文化、經濟與個人關係，常被證明遠較非洲人士與共產國家連結的目的與感情，來得持久與有意義。

無疑地，南非一直無法成功地給予其黑人公民充分的自由與公平，這使得後者的不耐與憤懣更是火上加油，結果導致黑人準備與共產國家結盟，企圖推翻南非政府。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南非問題愈是不能解決，拖得愈久，則蘇聯與中共在非洲擴張勢力的機會也愈大。關於這點，可能會有下列三種情況出現：

第一，非洲人士對於西方世界不願意斷然抵制南非而感到不耐的情緒愈是高漲，則愈有可能促使非洲國家聯合共產國家對抗南非。

第二，共產國家捲入非洲事務愈深，相對地，將意味著西方在非洲的影響力減弱；這就是說，非洲國家將會愈來愈容易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傷害；非洲原有的價值觀與權力結構也就跟著瓦解了！

第三，南非週鄰地區的衝突愈是持久，南非發生流血革命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屆時，就可能出現一個信仰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權，並仰賴共產國家的支持與保護。

假若南非內部與鄰區的衝突繼續蔓延與尖銳化，而造成共產勢力控制南非及非洲其他地區，那麼，一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對非洲人民而言，這種情況將使他們對更美好生活環境的憧憬破滅，更壞的，最後將使他們淪為奴隸。倘若非洲國家在其反南非鬥爭中，引進了共產勢力，那麼，波蘭、匈牙利、東德、波羅的海三小國、阿富汗、西藏、寮國、高棉等地區人民的苦難，就是非洲人民未來命運的借鏡了。一旦非洲人士發現，不是他們在利用共產國家，而是共產國家在利用他們以遂其目的時，一切就太遲了，他們對無法阻止非洲在鐮刀與鐵槌下再度淪為殖民地了。

西方國家也試圖以經濟制裁來摧毀南非的經濟基礎，可是，他們却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破壞所帶來的混亂，必然會導致一個由共產勢力所控制的獨裁政權上臺。假如西方世界真能容忍南非這樣有豐富礦產、強大工業基礎與戰略重要性的國家淪入共產世界，那麼，全球人士將會了解西方世界已趨衰微，且臣服於馬列主義勢力之下。

二、如何避免悲劇的發生

沒有一位愛好自由的人士，會對以上的悲劇處之泰然。問題是，是否有方法加以防止。

基於下列兩個信念，我相信，方法絕對是有的。第一，南非與非洲人士間的對話是可能的，而且還可以對南非問題提供一個明白的解決方案。第二，造成南非白人今日行爲的動機主要是對未來的恐懼，而非種族優越感。所以我相信，只有用有意義的對話，才能解決南非的種族衝突問題，因為對話可以舒緩南非白人的憂懼，引導白人尊重黑人同胞的權利與尊嚴，以及鋪設通往公平社會的大道；在這個公平社會中，所有個人的才能均得以充分表現，且爲大眾所分享。

在處理對話問題前，似乎必須說明一點，南非白人行爲之動機是恐懼，而不是種族傲慢。雖然，這種看法可能還不太普遍，但仍不失爲一客觀研究南非問題的方法之一。

假如要瞭解現在南非政府的行爲，就必須先研究非荷人（Afrikaners）（南非白人的祖先）在其史書中所提供的解釋。

在這些解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非荷人視其民族一直在威脅中求生存。這些威脅包括壓倒性多數的黑人的威脅、「人道主義」觀念與理想的威脅、西方國家機會主義的威脅，以及莫斯科所策劃的「總攻擊」（total onslaught）的威脅。非荷人的世界觀，主要是由所謂的「大旅行」（Great Trek）的經驗所塑造出來的。一八三〇年代，非荷人的祖先離開英屬好望角殖民地，向北移民，深入不毛與未知的非洲內陸。他們乘坐著牛車向北緩緩移動，車上載著的就是他們所有財產。面對著黑人部落突擊的威脅，除了靠自己外，沒有任何人可以求助。因此，有很多非荷人在黑人的攻擊、伏擊和大規模的屠殺中，喪失了生命。南非白人對外界的看法，也受各次征服戰役（一八八〇～一八八一，一八九九～一九〇二）的痛苦經驗之影響。在這些戰役中，強盛的大英帝國大肆攻擊非荷人的共和國，但是這擁有最豐富金礦的共和國，却阻礙了帝國主義的擴張。儘管國際社會同情非荷人，但西方國家並沒有協助非荷人抗拒英國。有成千上萬的非荷婦孺在英國的集中營中喪生；之後，英國對失敗的南非白人展開了有系統的英化政策，此使得非荷人認爲非荷國家之生存，是處於危險的環境，而且相信在生存鬭爭上，除了自己外不相信任何人。

因此不容置疑的，對於國家以獨特的語文、文化、宗教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而維持存續的關切，是構成南非白人心態的重要特徵之一。南非白人相信，他們若與其他種（尤其是英語系或有色民族）分享政治權力，就會使其國家生存陷於危險境地。此一信念成爲南非白人民族生活的基本信條之一。一九四八年當民族黨（National Party）上臺後，這個信條促使當局剝奪了雜色人（混血人）的公民權，並延遲了企圖限制黑人的政治權利在其族居地行使的辦法。正如前文所述，這些行爲的動機主要是

恐懼，而不是種族優越感。這種恐懼感造成了種族隔離政策，及非白人的不公平、屈辱和艱辛。

假如生存的恐懼而非種族主義，確是造成這個不人道且殘酷的種族隔離政策的動力的話，則必然有些跡象顯示，一旦非荷裔的民族黨意識到，種族隔離政策不再與其國家生存攸關，他們就會樂意修正其種族政策。事實上，這種跡象越來越多了。南非政府似乎已理解到，種族隔離政策對國家生存是一個重大的威脅，目前正逐漸在放棄或廢止這個政策之中。

我還可以舉出一段文字，來證明這種頗具希望的發展，此即一九七六年四月廿日在一家頗具影響力的倫敦週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上發表的：

「非洲大陸南端的荷裔白人部落，是以生存本能為核心而建立組織起來的；因為他們無處可去。」

該文表現出來的信念，就是南非荷裔白人求生存的本能以及它了解處在敵意環繞的世界中的孤立地位，也許導致它「爲了要多存在十年或十五年以上，不得不採取的必要適應政策。」

過去八年來，尤其是最近的三年，我們可以看到南非在政治與立法上的改變，顯示了與傳統種族隔離政策已有決定性的分野。

三、南非的改變

一九七八年九月，即波塔(P. W. Botha)任南非總理的頭一年內，他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表示：「不應變即滅亡」，此話令其支持者感到震驚。此後，他在無數的場合中，都警告白人說，不能長期地無視這個國家內其他團體的存在。更特別的是，他告訴那些白人，如果內部存有嚴重的不滿，就無法抵抗外來的侵略。因此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廿日的國會開幕式上，波塔說：

「政府承認，使黑人社區有挫折感的瓶頸仍然存在。：凡是具有責任感的南非人民，都應該瞭解到，祖國的安危最後還是在於，我們全體人民是否已準備接受全體社區的利益與目標，而不計種族的差異③。」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南非俱樂部(South Africa Club)在倫敦薩弗依旅館(Savoy Hotel)舉行會議。南非著名的商界領袖歐本海默(Oppenheimer)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他提到自一九七六年索維托暴亂(Soweto riots)以來南非的重要改變④：

註③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85,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Second Series No. 7859, 28 January 1985, p. ME/7860/B1-9:

President Botha's Address at Opening of South Africa's Parliament, p. 4.

註④ Address by Mr. Harry Oppenheimer to the South Africa Club, Savoy Hotel, London, Wednesday 17th April, 1985. *Background Briefing*, No. 22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hannesburg), p. 3.

南非何去何從：革新抑或革命？

「一九七六年，國會中只有白人，政府還決定這種情形要無限期的繼續下去。到了一九八五年，國會與內閣出現了雜色人種與印度人。此外，很明顯的，他們並不是用來做花瓶裝飾的。一九七六年，黑人官員的任期沒有任何保障，更遑論在都市地區的租賃權，因為他們只被視為暫時的移民。可是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九九年租賃制度下，黑人不僅可以擁有房子，並且很快地就可以拿到自由所有權。政府也鼓勵黑人獨立創業，大城市的中央商業區也在平等的條件下，開放給所有的種族。」

一九七六年，政府執行的是一種限制流動的制度，目的是在限制及最後杜絕黑人流入所謂的「白人」城市。今天，黑人流入城市，已經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必然的趨勢，全面的流動控制制度，已列入再檢討的範圍。」

由合作與開發部副部長的談話，更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上述諸發展所引起的鉅大變化，他在一九八二年時承認，南非處理都市黑人問題的進展仍是相當緩慢，因為「我們相信，非洲人士在這裏（指城市）只是暫時的；他們還會回到原來住的地方；我們也認為不應提供給他們太多的設備，因為唯恐他們會停留得太久。最後，我們認為這些非洲人士應該在他們的故鄉內行使他們的權利^⑤。」

「在一九七六年，法律規定，所有工業上的技術性工作都得保留給白人。但是此後，整個工作保留制度已被放棄了。人們已公開的承認，更多的黑人必須做技術性的工作。」

當一九七六年時，混合各種族在一起的工會是非法的，甚至在勞工法中，黑人工會也不被承認。而今天，混合工會或黑人工會，都是與白人工會一樣的運作，黑人工會運作的規模不僅大而且有力，成長更是迅速。黑人的薪資也增加得很快，它與白人工資間的差距也接近了。例如，一九七〇到一九八四年間，黑人工資在實質上上升了百分之九五，而白人工資僅提高了百分之十一。在這種發展下，一九七〇年時，平均白人工資是黑人的六·七八倍；在今天，這個比率已下降到三·八六倍。今天，同工同酬的原則更是普遍。

一九七六年時，黑人教育不僅與白人分開，而且基於政策之考慮，故意抑低黑人的教育水準至與其在工業上的低劣地位相當的程度。可是現在，官方已接受並承認，黑人教育在任何一方面，都必須與白人教育平等。政府還開始著手這一漫長且艱辛的工作，期望能將這個夢想轉變成事實。」

今天，進大學的黑人學生與白人一樣要參加入學考試，且這已行之有年了。一些曾是白人唸的大學，如維特瓦特斯蘭德大學（Witwatersrand University）與蘭德阿非利堪大學（Rand Afrikaans University），現都已接受黑人、雜色人和印度裔學生。

註⑤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83,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in South Africa 1982*, Johannesburg, p. 275.

一九八四年時，政府還廢除了「通婚法案」與「不道德法案」中的第十六條，而使跨越種族界線的婚姻與性關係合法化。當然，無人會期望這些法案的廢除會立即改變人類的感情與社會習俗。社會距離的縮小應是自然演變的結果，而不是經由法律條文強制執行的，所以，社會距離的縮小是需要時間，慢慢來的。同時，不廢止或至少修改那個區別種族住區的團體區域法（Group Areas Act），也引起不同種族間結婚的夫婦應住在何地的問題。

一九八五年九月，在伊利沙白港（Port Elizabeth）揭幕的開普民族黨（Cape National Party）大會中，波塔表示：

「我及我的黨將遵守一個地理上統一的南非、普遍公民權和普遍參政權等原則。：我願意重組總統的行政會議，以包括黑人在內。：所有的團體與社羣都要接受政府最高階層的建議了，將來在都市中的黑人社區，享有與黑人權益有關之事務的自治權，在與其他團體有關的事務上，並可在中央政府扮演有意義的角色。」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自由國家民族黨（Free State National Party）在布羅方丹（Bloemfontein）召開大會，波塔在開幕演說中宣佈，將恢復川凱斯（Transkei）、波布薩茲瓦那（Bophuthatwana）、溫達（Venda）與希斯凱（Ciskei）四邦的黑人公民權；當他們的居住地被劃分為四個獨立邦時，這四個邦的居民喪失了公民權。現在，這四邦的人民不論是否住在其原住地的境內或境外，都可享有南非的公民權。波塔承認因喪失公民權所引起的嚴重的挫折感，已造成一種拒絕感，以及他們與南非的財經資源一刀兩斷的感覺。」

國會反對黨領袖斯拉伯特（Dr. Van Zyl Slabbert）形容政府改變公民權的政策「具有基本意識形態上的意義」，以及「種族隔離夢魘的結束」^⑥。根據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的星期日報報導《Rapport》之解釋，「公民權的承認不僅意含著可取得護照與其他類似文件的權利，還意含著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人性尊嚴的充分承認」^⑦。爲了響應公民權的宣佈以及總統的行政會議所提出的廢除遷徙控制的建議，反政府的黑頭巾（Black Sash）組織的主席也宣稱：「：不過，這完全改變了所有有關種族隔離政策的內涵」^⑧。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在德班（Durban）舉行的納塔民族黨（Natal National Party）大會上，波塔的一席話使民族黨的一項基本政策宣告死亡了。這個基本政策就是，所有黑人的原住地終必取得獨立地位，而後南非就沒有黑人了。波塔的說法是

註⑥ S A Digest (Pretoria), 4 October 1985, p. 899.

註⑦ S A Digest, 20 September 1985, p. 851.

註⑧ S A Digest, 20 September 1985, p. 851.

註⑨ Quoted after S A Digest, 20 September, p. 867.

註⑩ Financial Mail (Johannesburg), 20 September 1985, p. 42.

：「不能強迫任何一個社區獨立。所以，如果任何一黑人民族邦不想要獨立，則該邦或社區仍還是南非國家的一部份，擁有南非公民權，並為南非共和國政治制度所容納」^①。

在同一篇演講辭中，波塔還宣佈，「今天我堅信，我們已經跨過了魯比空河 (Rubicon) ^②。我們不可能再回頭了。」
所有南非發展問題的觀察家都會同意波塔的說法——南非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到，南非改革的過程，可能因白人選民的強烈反對而中斷，或者因黑人城鎮的暴動而中斷，或者可能因受到國際經濟制裁而中斷。但是，內閣部長和高級官員却一再聲明，唯有政治解決——而不是武力——才能有效地恢復黑人地區的和平，顯示南非政府已覺悟到其過去政策已造成了不少挫折與暴亂。

毫無疑問的，南非政府大抵已承認種族隔離政策已告失敗，而且不希望再有一種不把各種族團體之密切互賴關係考慮在內的政策。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南非外交部長畢克·波塔 (Pik Botha) 發表談話說：

「決定這個國家未來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在共同責任、安全與繁榮的體系中尋求和平的人；另一種是爲了意識形態上的目的，而要建立獨裁政體，並強將此一政體加在所有南非人身上的一羣人^③。」

數天以後，畢克·波塔承認，「南非現在已出現了經濟完全整合的現象，每一個私人企業均須依賴所有的種族團體」^④。他又繼續說：

「我承認過去幾年來，我們制訂過多的法案，注意力過於集中在社區的支離劃分。：但是現在我們已清楚地看到，我們有相同的地方，我們正注意這些相同的地方，不再只著眼於歧異處^⑤。」

當我們討論南非爲了避免大規模的動亂而亟欲進行改革這個問題時，往往會忽視波塔不是一個獨裁者，而是一位民選政府的領袖。而不可能違背大多數選民的意願這樣一個事實。正如衆所周知的，這些選民都是白人，他們正受鼓勵中，希望他們能讓出更多的經濟與政治權力給黑人同胞。要求任何一地的統治團體自動讓出一些權力或特權，是種過多的要求。在南非白人的這個例子中，還存在著特別的障礙，因爲大多數的白人認爲，與黑人分享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馬克思主義一黨專政的出現，所有的權力都會集中在一個由莫斯科或北平有效控制的小派系中。南非鄰境的津巴布韋、莫三鼻克與安哥拉境內所發生的事件，更加強了南非白人這種看法。此外，有關非洲大陸各地飢荒、經濟崩潰和行政無能的報告，亦加深南非抗拒根本改變現行的政治制度。

註① Pretoria News (Pretoria), 16 August 1985, p. 9.

註② 冒重大危險，以破斧沉舟之志而採取行動之意。(魯比孔河位於意大利北部，公元前四十九年凱撒會越過此河與羅馬執政者龐培決戰。)

註③ The Star (Johannesburg), 15 October 1985, p. 4.

註④ The Star, 25 October 1985, p. 15.

註⑤ Sunday Star (Johannesburg), 8 September 1985.

儘管有嚴重的疑懼存在，但南非白人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再也不能繼續維持現狀了，因為他們不能在享受豐富生活的同時，而讓黑人也獲得脫脂牛奶和美好未來的承諾。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明顯的證據，白人的思想已開始有基本的轉變。我們將在下文徵引一些事實證據。

首先，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舉行的複決新憲法的公民投票中，有三分之二的選民投贊成票（六五·九五%），另三分之一則投反對票（三三·五三%）^⑥。這個新憲法的主要議題僅僅只是有關雜色人與印度人（不包括黑人）的政治權利。大多數的選民瞭解到，拋棄長久以來所建立的「不與有色人種分享權力」的原則，將為黑人取得參與中央政府之有效政治權力而鋪路。

其次，在一九八五年間，種族隔離政策所仰賴的意識形態基礎，最後却由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the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資助而發表的「團體間相互關係之調查研究」（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roup Relations）報告所推翻。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乃是由政府供給經費的一個科學研究機構。除了這個研究委員會外，有數十個南非主要學術機構、社區領袖與高級政府官員也都參與了這項研究調查計劃，他們的研究發現，將作為未來施政的重要基準。該委員會報告中的一些結論，摘錄如下：

「……依據原先的種族隔離之模式所建立的各團體間關係的政治秩序，已步上了死胡同；建設性的關係，將不可能沿這條路線進一步發展下去。……很明顯的，若要團體間的關係朝和諧與相互適應的方向發展，就得動員一些溫和的力量。……在南非，團體與團體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須予以最迫切的關注。拖延對這件事情的注意，將會招致毀滅性的後果^⑦。」

第三，事實上，任何位居要職（無論是商業、行政或學界）的南非白人，每天都會碰到訓練不足與欠缺技術之人力的問題；他們了解人口比例日漸下降的白人，是愈來愈不能符合實際的需要。因此，他們共同了解，唯有準備把黑人引進技術性職位，甚至引進最高階層，纔能配合國家日益增加的勞力需要。同時，一般社會人士也瞭解到，一旦黑人擠上了社會經濟的階梯，就不能再拒絕他們所提出的充分的政治權利之要求。

第四，南非商業家與經濟學者一再地強調，只有當黑人的購買力增強的時候，製造品與其他產品的國內市場才會成長。但也只有當各層次的生產力獲得改善時，個人平均所得才能上升；這些均需要較好的教育與訓練，而後者須與較高的政治意識及要求

註⑥ *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1983*, p. 88.

註⑦ Main Committee: HSRC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roup Relations, 1985, *The South Africa Society: Reality and Future Prospects*, op. cit., pp. 172/3.

相配合^⑧。

由以上對南非改變政策的簡短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南非政府正在採取某些重要步驟，以消除種族隔離政策。另外，白人團體也已準備好邁向一個分享的社會政治體系，不僅分享政治權力，而且分享一切事務。

四、黑人對改變的反應

前面的概述的確具鼓舞作用，但對於改革的步調與方向是否能使黑人滿足的重要問題，却沒有提出解答。很多跡象顯示出，波塔政權所宣示的零星讓步，並沒有影響相關的黑人之輿論。就在筆者撰述期間（一九八五年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內），在黑人 and 雜色人居住的城鎮內，暴亂持續不衰。沒有任何著名的黑人領袖，對於南非當局廢除令人憎惡的種族隔離制的重大成就，表示感激。

黑人的這種反應並不令人訝異。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在《索威坦》（*The Sowetan*）刊物的社論中，已明白的表現出黑人的懷疑。黑人認為，所有那些廣為宣揚的改革，只是爲了要加強白人對權力的壟斷。此外，黑人亦認為這些改革只是使黑人回復到種族隔離政策實施以前的日子而已。最後，《索威坦》還指出，這些改革措施只是對黑人暴動或抗議的一種因應而已，黑人爲這些改革曾付出成百生命的代價，以及使都市黑人備嘗艱辛，因此，黑人沒有什麼理由，應該爲這些改革歡呼雀躍^⑨。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一點，暴動僅部分地是由羣衆抗議所引起。激烈團體在黑人城鎮中有足夠的幹部來動員中級學校的學生與失業的年輕人，並威誘其他被動的大多數人民。這些激烈團體包括官方禁止的非洲民族理事會（*African National Council*）及南非共產黨（*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這兩個團體的領導人經常是重疊的。至少在目前，暴動只被視爲是少數份子的行動而已。

然而，若認爲有愈來愈多的黑人相信，外在在壓力會無情地將南非的權力平衡轉對白人不利，因此黑人就沒有理由與一個氣數將盡的政權妥協，這種看法基本上是種推測。當然，這種評估很難得到證明的。不過，這種推測乃是基於一個特殊的事實，即南非政府一方面聲稱要與重要的黑人領袖談判，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指出誰是對話者，肇致談判不信任。此論點也基於下述事實，即黑人發言人堅持，他們「真正的」領袖已經被政府關在監獄中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

註⑧ 根據 UNISA 市場研究部調查，一九七〇年時，黑人佔全南非購買力的百分之二二·三，到一九八五年時，黑人購買力則上昇至百分之三一·八。見 *The Star*, 29 August 1985.

註⑨ *The S A Digest*, 20 September, 1985, p. 867.

。這些黑人又指控政府祇是與一些黑人「傀儡者」或「背叛者」在對話而已。

但是，有許多真正的黑人領袖，其權力不僅來自傳統（多數是世襲的酋長），而且在其原住地和獨立邦內自由選舉而獲得勝利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士包括族魯（Zulu）領袖布地勒齊酋長（Chief Mangosuthu Buthelezi），他所推行的因卡達運動（Inkatha Movement）是最有效的黑人羣衆組織。其他較不為人知但具相當能力者，如勒巴威（Lebowa）的巴杜弟博士（Dr. Cedric Phatudi）及卡柴古盧（Gazankulu）的涅柴維斯教授（Hudson Ntsanwisi）。這些人士均贊成經由對話與談判來進行改革。波塔政府必須提供這批溫和人士一些具體的改革方案，諸如權力的分享，以確保他們的權力不致落入激進份子的手中。

目前南非的安全部隊雖然已將動亂控制在黑人城鎮中，此一情形已持續有一年之久，外界觀察家乃不得不對升高的暴力與反暴力活動，及其對各種族團體間的關係、商業信心和國家未來的命運所帶來的困擾，表示重大關切。

想預測這個陷入混亂的國家之未來情勢，是相當魯莽與冒險的。不過基本上，考察以下兩種可能情況之一，似乎是安全穩重的。

第一個可能情況是，無休止的暴動，最後發展成黑白人間的全面流血鬪爭，然後在共產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干涉下，結束這場流血鬪爭，最後導致非洲民族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建立一個親共的政府。果真若此，毫無疑問的，這場流血鬪爭所造成的毀滅程度，將遠超過吾人想像之外。

第二個可能情況則是，持續的改革終將導致一個開放的社會，各種族與民族不再主宰經濟或社會地位或獨占政治權力。即使在這個過程中，仍會不斷地發生動亂、流血事件與挫折，但却不致完全摧毀南非國家結構^②。

當然，上述兩項基本的可能情況，可能會有許多的變數加以影響。因此，法律與秩序的全面崩潰，將造成有效的軍人接管政府，這是十分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要想恢復商業信心的機會，就極為渺茫了。而且，隨著經濟的嚴重蕭條，對革命勢力的鎮壓，也只能維持一段時間而已。

許多年以前，南非的一位偉人，艾倫·巴頓（Alan Paton）曾警告他的白人同胞說，有一天當他們轉而喜愛黑人同胞時，將會發現，黑人同胞已轉而憎恨他們了。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南非白人的確在修正其態度與政策，以便能容納黑人的正義要求。可是，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是否能達成有意義的對話及建設性的解決方案，還是受挫的期望與累積的憎恨終於強過對和平循序進步的要求。

註② 其他的情況則參見 *The Economist* (London), Vol. 296, No. 7470, 17 August 1985, pp. 16-18.

五、訴諸對話

無疑地，在普列托里亞出現一個由共黨控制的政府，將會為整個非洲與自由世界帶來災難的後果。

不幸的，大多數的非洲與自由世界的領袖，都太貫注於他們切身的問題，而未能顧及到南非這個定時炸彈的滴答聲所帶來的訊號。象牙海岸的伍弗布尼總統 (Houphouët-Boigny)，是少數有先見之明者。早在一九七一年，他就看出這些問題的嚴重性。當時他警告說，共產主義的危險性遠超過種族隔離政策：

「只要共產主義介入所有的戰爭……我們這些年輕的非洲國家，只有採取『真正的』中立政策，才能避免發生在亞洲般的可怕悲劇。」

：我們如果犯了疏忽盲從狂熱主義的錯誤，而為了種族隔離政策而與南非進行戰爭，我們將給共產主義提供一個新的機會，我們知道共產主義常等待機會介入而造成可怕的後果。②」

幾年來，伍弗布尼一直不厭其煩的重複這個警告。同時，他還主張與南非進行對話。他承認南非的白人也是非洲人，並深信，在改變他們的態度上，對話遠比戰爭更為有效。無論如何，黑色非洲憑自己的力量絕不可能勝過南非強大的軍力。

一九七五年四月，非洲團結組織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部長會議在達爾——薩拉姆 (Dar es Salaam) 舉行一項特別會議，象牙海岸的外交部長阿森·俞舍 (Arsene Usher) 傳達了伍弗布尼總統的意見：「假使我們允許馬拉威大使成為唯一的非洲駐南非大使的話，他將一事無成。可是，如果有四十二位黑色非洲大使派駐南非，再加上四百名外交人員與二千名外交人員的子女，他們住在未隔離的房子裏，上未隔離的學校，那麼，種族隔離政策就會消失了。」② 這位外交部長又重申了伍弗布尼總統在一九七一年向非洲統一組織高峯會議所致送的咨文：

「經過深思熟慮後，我相信，如果我們透過中立途徑來追求和平的話，則與南非白人的對話是可行的。」

最近在一九八五年的十月，伍弗布尼總統再度強調，他相信對話是談論南非問題及防止那可能威脅非洲未來之不幸衝突的唯一妥當的方法。

「我們之所以一直渴望對話，不只是為了南非，也不只是南非才有種族歧視；每一個地方都有歧視的存在。讓我們先來自清門戶吧！在黑色非洲的每一個角落中，都有少數團體的存在。但是有那塊地方是保留給他們的呢？他們參與過政府嗎？他

們出席議會嗎？或者參與過行政單位？不！他們不爲人所見；他們生活在貧民窟中，況且，還是在黑色非洲裏面！已採取的強制性措施，使得南非白人必須承認黑人的權利平等。本人，正如同你們一樣，爲這些措施而歡呼。然而，這個事件的實際含意又是什麼呢？當禁止賣武器給南非白人的時候，我們鼓掌歡呼。可是，南非白人有高度的科技知識，以致他們可以自製武器。所有這些建議，都是不負責任的……

我們寧可選擇對話，儘管它很艱難及緩慢，但其結果却能拯救那失血過多的黑人種族……^②。」

進行認真的對話，並不表示同意把在統一國家內的所有種族團體融合在一起，必須如同西歐大部份同質國家的發展模式。相對的，有些政府形式是專門爲多元社會而設計的，諸如李華特教授 (Arend Lijphart) 所提出的「聯合政府」(consociation) 或是奧地利卡爾·雷南 (Karl Renner) 主張的雙軌聯邦主義 (two-track federalism)^③。波塔總統現正在正確的道路上尋求一種體系，使得南非的每一個種族團體在政治上不成爲統治團體或被統治團體。

上述的析論和看法，從波塔總統在本(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南非國會發表的演說中，獲得樂觀的迴響。波塔公開宣稱，一九四八年民族黨上臺後所實施的種族歧視政策，是一種落伍的觀念，並重申南非人不論黑白均享有同一公民權，獲有同等待遇及工作之權，與接受教育的機會^④。

他並強調黑人的「國家法制委員會」(National Statutory Council) 是政治權力分享制度化的起步，黑人領袖可藉此在中央政府中表達他們的政見。波塔總統一再強調政府決定邁向政權分享大道。務使機會均等、待遇平等、正義伸張。波塔另外在到處散發的大幅「政治廣告」中，也正式宣稱適用於黑人的「通行證」，將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廢止。他說，改革措施將繼續推行，「革新之輪將運轉不息」(The wheel of reform is turning)^⑤。

綜觀波塔總統所宣示的各項針對種族歧視的革新措施，我們有理由相信，祇要革新措施的速度不太緩慢的話，南非終可避免因種族歧視所引起的動亂和革命。

^② BBC 1985,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22 October 1985, President Houphouët-Boigny's 14th October News Conference, pp. ME/8088/89 and 10; also see *West Africa* (London), 21 October 1985, p. 2191/2.

^③ See Friedrich Prinz, "A Model of a Multinational Society as Developed in Austria-Hungary before 1918," in Nic Rhoadie, ed., *Intergroup Accommodation in Plural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1978), pp. 44-52.

^④ *S A Star*, 5 February 1986, p. 7, 及摘錄自南非駐華大使館提供之油印文件。

^⑤ 同註^④。

(本文作者係巴黎政治學院畢業，巴黎大學國際法學博士，曾任我國駐上伏塔、甘比亞及象牙海岸大使，現任淡江大學教授兼歐洲研究所所長及區域研究中心執行長。)

南非何去何從：革新抑或革命？